

熊易寒
著

平衡木上的中国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平衡木上的中国

熊易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衡木上的中国 / 熊易寒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086-5871-1

I. ①平… II. ①熊…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2161 号

平衡木上的中国

著 者: 熊易寒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5086-5871-1/F·3589

定 价: 32.00 元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如果 1978 年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是“速度与激情”，是迈向经济大国的疾步奔跑，那么，最近几年，中国的主旋律则慢慢转向了“中道与平衡”。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缔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将眼光转向奇迹的另一面——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地区差距和贫富分化。只有正视这些问题，中国奇迹才会从不可思议的“奇迹”转变为理所当然的“常态”。“奇迹”的潜台词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不知道这一切还能持续多久；而波澜不惊的“常态”则意味着经济增长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如何平衡增长与稳定、经济与环境、国家与社会、效率与公平，以及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化，这是当前中国无法回避的难题。上述诸矛盾，可谓相生相克。高速度、低质量的经济增长会破坏社会稳定，但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经济增长；环境污染让人们深恶痛绝，但污染企业同时也在提供就业、创造利税；国家如何在为社会赋权的过程中，减少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同时保持强大有效的国家能力；效率需要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以形成选择性激励，但过度的不平等又会损害人们的积极性。社会分层让人们又爱又恨，阶层的固化让底层的孩子们失去希望，可是一个完全流动、父辈地位无法继承的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又会让中上



层的父母失去念想。穷孩子渴望社会流动，富爸爸期待地位延续，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在阶级再生产与社会流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才是一个充满活力又相对稳定的社会。在任何国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所难免，这也是推动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动因，人们总是流向最具经济活力的地方，那里收入更高、机会更多；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长期的人口流动会使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趋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移民的多寡是一座城市繁荣与否的标志。然而，我们的一些城市却视外来人口为洪水猛兽，认为他们是交通拥挤、房价高企、犯罪率上升等一切城市病的渊藪。

正是由于利益的失衡，当下中国的社会冲突频仍：环境抗争、邻避运动、土地抗争、劳资冲突、拆迁矛盾、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冲突实际上反映了增长与稳定、经济与环境、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社会冲突并非洪水猛兽，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冲突，一定程度的冲突还有助于社会的自我革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回应和解决社会冲突？

制度化的本质就是稳定行动者的预期，进而塑造行动者的行为。长期以来，中国的维稳体系都是用特事特办、个案处理的非制度化方式来应对社会冲突。这种维稳体系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非常高，而且缺乏程序正义，往往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最终，不仅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消耗，政治信任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侵蚀。

制度化的前提是社会的组织化。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绝不是原子化个人的集合体。商会、工会、业主委员会、NGO（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构成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利益的组织化并不会让利益变得邪恶，而只是确保每一种利益都能被国家和社会听见。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声音实在太微弱，加在一起又太嘈杂。任何国家都无法回应如此繁杂的诉求。利益组织化

的过程让人们的利益得到聚合，从无限的混沌到有限的多元，经由国家的利益整合，公共利益也就呼之欲出了。私人利益可能出于人们的本能和欲望，是不证自明的；而公共利益只有被公众认同才称其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一定是被国家和社会所建构的。建构公共利益的原则就是平衡，平衡就是正义。让每一个个体和群体都有机会进行利益表达，都接受一套程序和规则来对利益进行综合，并相信这个综合的利益至少包含了自身的部分利益。一个社会若没有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就很难建构所谓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背后是共识。有了被广泛接受的公共利益，才会有真正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

在我看来，政治的艺术在于平衡。如果承认人人平等的原则，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对于政府而言，每一个公民和群体的合法利益诉求都是平等的，只不过不同的利益诉求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政府不能过度偏好某一类利益诉求，而无视另一些利益诉求，政府的角色是综合、调和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益诉求。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趋缓的势头，长远来看，这未必是坏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时，人们会普遍处于一种乐观的情绪当中，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必要的；况且，形势那么好，人们也不愿意承担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GDP（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最好的面霜，有一白遮百丑之奇效。经济下行反而可能为改革提供契机。因为问题再也遮盖不住了。改革的潜在风险变小，潜在收益变大，也有利于改革的总动员。

我们也许无法让每一个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不应该为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设置障碍，并对这些完成110米跨栏的孩子说：“别人的百米跑成绩比你们快多了！”这是程序正义。我们也许无法让雾霾在短期内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将治理污染的任务交给下一代，更严格的环境执法未必会让经济形势恶化，相反会驱使企业采用



清洁节能的新技术，而这又会刺激环保产业的发展，降低环保设备和技术的成本。这是环境正义。我们也许无法弥合中国的地区差距，但我们至少可以让不同地区的人们自由地流动起来，让市场将他们配置到最能实现他们价值的地方，并让公共服务同步跟进，这将比财政转移支付更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让公共资源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是将其变为束缚人的工具。这是分配正义。

Contents 目录

自 序	V
第一编 中国底层社会观察	1
命运的政治学	3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16
第二代移民的生活机遇与分配正义	38
公民劳动者：农民工的尊严、权利与梦想	44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	49
中国农民工真的不重视家庭团聚吗？	57
流动中的婚姻关系与单亲留守儿童	60
新穷人的全球图景	63
第二编 失衡：利益分化与社会冲突	73
沿海地区新阶层的兴起与城市治理	75
叉腰肌、业委会与社区管理	96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101



市场“脱嵌”与环境冲突	109
高校工资改革：人应该比设备贵！	116
素质教育、职业教育与社会流动	122
第三编 政治平衡术	131
官员 GDP 崇拜的体制性根源	133
地方政府要告别压力型体制	138
环保教育、环境运动与国家战略	143
寻找公约数：利益政治时代的冲突与协商	152
后 记	161
编后记	163

第一编 中国底层社会观察

命运的政治学

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分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

一、人生的岔路口

1999年9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车，进入了我的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以至于我忘掉了日期。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告别了农村，不同的是，我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

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跟他讲述大学里的逸闻趣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跟我诉说工厂劳动的酸甜苦辣，在那里，再没有人欣赏他漂亮的钢笔字，再没有人崇拜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才华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找不到位置，尤其让他感到挫败的是，高中毕业的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初中毕业生的管理。我们的生活大相径庭，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会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大约一年后，随着他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随着我们共同话题的日益减少，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老家的街头不期而遇。他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牵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夫妇现在在东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上学的女儿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我们激动地寒暄着，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发问，而他最关心的是我一个月赚多少钱，穷追不舍，让我不知所措。临别握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右手失去了两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电话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工友不小心轧断了手指，这让他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会不会也被机器轧断？

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打过去却是空号。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从那时起，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十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政治学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农民工及其子女。命运让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们曾经多么相似。

二、命定的博士论文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作“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

要问我是谁 / 过去我总羞于回答 / 因为我怕 /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 / 送他们上学 / 不是开着本田 / 就是开着捷达 / 而我 / 坐的三轮大板车 / 甚至没有装马达……

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一个从中部农村走进大上海的青年，虽然只是一介穷书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贴，不得不四处兼课以求温饱，却为什么会与这些孩子及其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这就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奥秘。不管我与底层有多么亲近，我还是逐渐地脱离了这个阶级。我走上了一条通往城市中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尽管只是“慢车道”），而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三、城市化的孩子

当我把新出版的博士论文《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送给一位朋友时，她脱口而出：“城市化的孩子？应该是城市化的私生子吧？”这句犀利的玩笑话让我在错愕之余倍感贴切。

我之所以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城市化的孩子”，是因为：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放牛娃”



涌入城市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长期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李强教授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城市化的时间脉络与城市的空间格局中来思考，而不是把他们悬置在一个空洞的、无差别的、没有质感的时空之中。

“城市化的私生子”这个说法虽然刻薄，却也道出了部分真相。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及其子女，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价格优势，也是城市化率中光鲜亮丽的数字；另一方面，他们却存在于一个半合法的灰色空间里，仿佛私生子一般见不得光，他们不是官方承认的移民或市民，常常被视为挤占城市公共资源的“搭便车者”，甚或潜在的犯罪者和不稳定因素，就如同私生子构成家产和家庭团结的威胁一样。

这一群体同时兼具三个特征：第一，跨越城乡边界，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其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当中；第二，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市民资格）；第三，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底层。在他们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城乡对立、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三者相混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这样一个群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又在于：其一，农民工子女如何定位其自身（我是谁），即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二，农民工子女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独特经历将会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也即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试图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

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关系？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的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这些农民工子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命运。一方面，他们是“回不去的一代”。他们大多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没有务农经历，与乡土社会缺乏文化纽带和情感联系，他们不可能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而倾向于定居城市，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农民工子女无法像城市的同龄人那样享有各种权利和福利。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校舍简陋、师资薄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不仅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时刻面临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取缔。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时进退失据，处于就学就业的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在城市升学，目前只能进入中专、技校或职高。如果回到家乡念高中，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将不得不与父母分离，寄居于亲戚朋友家，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另一方面，家乡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学生回去之后也存在学业不适应的问题。由于升学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

四、相交的平行线

如果说我研究农民工子女是由于身份转换过程中的一种惯性，那么，张



轶超投身农民工子女的艺术教育，则似乎是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持久激情所支配，与身份无关。出身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的张轶超，与农民工子女的生活轨迹原本是两条平行线；然而，却偏偏相遇了。

2001年，尚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张轶超偶然看到一则关于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有着办报经验的他（时任复旦学生报社《常识》的主编），敏锐地意识到上海肯定也有这样的学校。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在复旦周边地区调查起来，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便发现了一片民工聚集区和四五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张轶超回忆说：

在杨浦区江湾新城民工聚居区里，有两样东西总是那么突兀地出现在来访者面前。一是这里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的集装箱大卡车——晴天，它们意味着尘土飞扬；雨天，它们意味着泥浆四溅。二是这里随处可见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垃圾堆，或盘踞在路边散发臭味，或漂浮在水面染黑溪流。四年来，这些始终没有变过。

六年前，我第一次踏进江湾新城，目睹这一切的同时，我也认识了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当时我带着一丝歉疚的心情问一个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我要当老师。”“当老师干吗呢？”“我要教出一群医生、歌星、作家、博士和老师，为祖国做贡献。”天啊，我在心里想，可怜的孩子，祖国又为你做了什么呢？

可是当我的目光接触到孩子那清澈的眼睛和坚定的神情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那点自私，意识到他给我带来的希望和勇气，于是便有了持续到今天的“久牵”……

随后，张轶超与《常识》的同事开始到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采访、调查，发现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差，五年级的孩子大半 ABCD 都背不好，由于历史课没有胜任的老师就让孩子们自修。张轶超等人很快在复旦大学拉起了一